

附錄(二)

我探索敦煌學的歷程

潘重規

八十年前，我國甘肅省敦煌縣郊外千佛洞，打開了一個封閉千年的石窟，發現窟中藏有數萬卷的古代寫本經典文書，其包孕之富、價值之高，使得中外學術界受到極大的震撼。所恨國寶飄零，被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本異邦人士大量捆載而去。我國學者往往求一覩原卷而不可得，遑論自由研究的機會。因此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感傷的說：「敦煌學者，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。」我個人見聞甚陋，接觸敦煌學甚遲。但是四十餘年來，斷斷續續地暗中探索，也有說不盡的辛酸甘苦的滋味。現在作一簡單報告，提供留心學術青年朋友參考，並希望碩學通人指正。

一、初寫論文

民國二十六年，抗日軍興，我隨中央大學到重慶任教。敵機疲勞轟炸，震壞了我市郊土瓜灣的木屋寓所。到民國二十八年秋，我應聘往川北三台縣東北大學中文系任教。系主任姜亮夫教授從巴黎帶回敦煌資料很多，有一次，他把最得意的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的照片見示，使我大開眼界。後來姜氏出版的「敦煌一偉大的文化寶藏」一書中一再提及，這個卷子「是尚書最要寶典，為隸古定最早之本」。我當時借得姜氏照片後，發現可以訂正清代段王諸儒的失誤非常的多。於是興高采烈地寫成第一篇有關敦煌學論文，在東北大學學報發表。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向宗魯先生看見拙文，來信大加獎勸，但從此卻不再有見到姜氏珍藏資料的機會。

二、再見異書

民國四十五年，我在臺灣師範大學任教，因受南洋大學之聘，前往新加坡。次年，被邀出席西德麻堡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，和慕尼黑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。便道訪書歐陸各大圖書館，獲得再見敦煌寫本的機會。民國四十八年，轉任香港新亞書院教授。每到暑假，便往巴黎、倫敦，坐在善本圖書室中，恣意披覽敦煌卷子。初時，我留心儒家經典，完成了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。出版後，日本學者頗多致書推崇。法國漢學泰斗戴密微教授不斷在通報撰文評介。我在這時期，深深感到抄本文字寫法的凌亂，每一展卷，真有「羣疑滿腹，衆難塞胸」之感；也因此養成了我讀書格外謹慎細心的習慣。

當民國五十六年秋天，我在巴黎閱讀敦煌卷子時，偶然發現鄰座的日本馬淵和夫教授，連日都攤開姜亮夫編的瀛涯敦煌韻輯，用敦煌原卷互相核對，我深深地感到詫異。因為我和姜氏同事多年，熟知他訪書英法的情況。他歸國後，寫成瀛涯敦煌韻輯二十四卷，自序說：「排日觀覽，歷時三年，抄寫疊揚，攝影校錄，凡書式裝樣，殘紋斷跡，靡不親自摹寫，校對無訛。」其凡例又言：「王靜安先生寫倫敦三切韻殘卷，羅氏爲印行；劉半農錄伯二〇一一卷，中央研究院爲之刊刻。王君誤者三百五十餘事，劉書則訛至二千條。」由此可想見姜書的精審完善。倘若有人再去加以核對，那真等於浪費時間。但是日本教授引起我的好奇心，也就隨意借出伯二一二九卷互校，原卷第一行作「刊謬補缺切韻序 朝議郎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」，這是最重要的標題，姜氏的摹本竟然漏抄，並在序文之首擅自添上「王仁昫序」四字，使我不禁駭然。因此，我決心要把姜書通校一遍。校完巴黎的卷子，跟著又去倫敦，幾個月的時間，發現姜氏的錯誤，並不少於他所指摘的王劉諸氏。姜氏書影響學術界頗大，使我感到有替姜氏徹底修訂的必要，所以一直逗留倫敦，加緊工作。不料九月二十五日的凌晨，突然接獲舍弟從臺北打來的長途電話，知道先母患腦溢血，正陷於昏迷狀態中，立即趕訂機票。候機時間，仍往博物館校完最後的一卷韻書。匆匆趕到機場，於下午六時半，由倫敦飛往紐約，轉飛東京，直到二十八日教師節的傍晚，纔回到臺北。經過兩個月，先母病況好轉，纔回香港學校授課。民國五十八年，又趁參加義大利漢學會議之便，重往英法，再細校姜書，寫成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書，哈佛楊蓮生教授，頗加讚賞，戴密微先生也在通報評介。由於我受到姜氏校書的警惕，我抱著勇士保衛疆圍、寸土必爭的心情，兢

兢兢業業，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大意，一點一畫的失落。

我因母病返臺，原已放棄了閱讀敦煌卷子的機會。沒想到母親住在中心診所醫療，隔鄰便是國立中央圖書館。我早晚侍疾，午後便往圖書館看書，無意間發現蔣慰堂先生運臺珍藏的敦煌卷子。我讀完全部一百餘卷後，寫成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一文，在新亞學報發表。日本石田幹之助老教授立刻在東方學雜誌撰文評介。牧田諦亮、金岡照光及法國吳其昱諸教授均先後來臺親閱原卷。少後，中央圖書館接納我的建議，將原卷影印出版。目前學者專家，根據此一資料發表論文的大有人在。我由此確信，做學問須要有好的環境，但最重要的還是一顆至誠的心。

三、巴黎集會，列城訪書

民國六十二年七月，我出席巴黎國際東方學會議，曾經主講兩次：一次講紅樓夢；一次講敦煌變文雙恩記。孟西科夫教授是蘇聯漢學界的領袖人物，一萬二千個號碼的敦煌卷子由他負責整理；又翻譯全本紅樓夢為俄文，由蘇聯國立文學出版社印行。他看見我研究敦煌文學和紅樓夢的論文，頗有同調之感，因此寫信歡迎我去參觀他的資料。我回信告知，東方學會閉幕之後，決定乘八月八日班機飛列寧格勒。巴黎到列城，只需四小時航程，去信二星期，竟然杳無回音。臨到啓程前夕，在裴亞蒙旅館，竟夜繞室徬徨，許多可能的壞結果，不斷在腦海衝擊，我茫然悵然，最後還是不顧一切闖向前去，我這時真有幾分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心情。

到列城後，孟西科夫因為得不到我的回信，卻已遠去黑海濱渡假。好不容易設法通知，苦等到八月十三日晨十時，纔承蒙孟教授陪我進入東方研究所，引導我參觀敦煌卷子和黑水城發現的文書，以及三十五冊乾隆抄本紅樓夢，總計居留十日，閱覽時放棄午餐，不喫不喝，也不過爭取到三整天的閱讀時間，但是三天筆記所得資料，回來居然寫出十萬字的論文。據孟教授告訴我，我是第一個來東方研究所善本圖書室的中國教授，然而日本教授來訪的卻在十位以上。我這次探險式的訪書，深悟到一個人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時，他的精神智慧會有意想不到的奇蹟出現！

四、邂逅雲謠，苦校變文

民國六十五年八月間，又去巴黎參加漢學會議，帶著準備好的研究計畫和資料，要從事預訂的研究工作。真沒料到，從倫敦轉機到巴黎，短短四十五分的航程，航空公司竟把我囊括全部研究資料的行李箱失去，使我在巴黎過了一個赤貧如洗的暑假，把原訂的研究計畫全盤打碎。湊巧衣袋中還帶著一冊胡適先生編的詩選，書尾附載胡先生晚年校訂的敦煌雲謠集。原是預備飛機上消磨時間之用的，現在竟成為我僅存的一冊敦煌資料。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，只好把它和巴黎藏敦煌原卷對校。後來又從友人處借來一大堆有關雲謠集的論著，居然自得其樂，忘記了世間一切。同居大學城英國館的方豪、陳奇祿、蘇瑩輝諸教授，見我一套西裝，身無長物，老是笑口常開，都認為我是樂天派。原來敦煌雲謠集的發現是文學史上一件大事，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詞的總集，它的發現使得文學史改寫了新的一頁。這分新材料，自民國十二年傳到東方後，羅振玉、王國維、朱彊村、況蕙風、劉半農、龍榆生、盧冀野、鄭振鐸、胡適之、王重民、唐圭璋、任二北、饒宗頤等無數詞家學者，不斷從事校訂整理工作。不料陰錯陽差，我也被驅使跟隨他們的行列。原以為矮人觀場，必無所獲，卻沒想到前輩先生們留下許多問題，竟被我解決不少。回國後親手寫成雲謠集新書一冊影印出來，承蒙鄭因百、蘇瑩輝、吳其昱諸教授大加誇獎，使我增加了寫作的勇氣和信心。

當我校完雲謠集之後，行李尚未找回，又向友人處借得王重民等編輯的敦煌變文集。變文是我國失傳已久的一種演述故事的講唱文學。在敦煌石室未開啓以前，從來沒有人見過這一類型的作品。因此數十年來研究敦煌變文的學者很多，而以王氏所編輯的為最完備，海內外學者幾乎全部採用這本書，做為研究的根據，它的地位是無法否認的。經我校讀後，又發現數不清的錯誤，逼使我近幾年暑假，頻頻去倫敦巴黎，繼續一校再校，苦熬著漫長的枯燥工作。好不容易，完成了一部敦煌變文集新書初稿，驀然回首，幾年的歲月，已經無影無蹤了。

五、創刊雜誌，開設課程

陳寅恪先生曾說：「敦煌在吾國境內，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，吾國敦煌學著作，較之他國轉獨少，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，僅三數人而已！」我很受感動，深深以此為我國學術界之恥。十年來奔走籌劃，與國內外友人合力創刊敦煌學雜誌，以圖光大斯學。歷來有關敦煌學著作，幾乎都用外國文字發表，好像那是中國以外的一門學問。故立定宗

旨，一律用中文撰稿；即使邀請外國學者執筆，也必譯成中文。使得研究中國的文獻，用中國文字發表，呈獻於世人之前。現已出版十二輯，第十三輯以次，交由新文豐出版社定期發行。又念要發皇一門學問，必須有優秀的人才，通力合作，方有成功之望。因此，在十五年前，我大膽的在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開設「敦煌學研究」一門課程，這是我國大學從未開設過的。所以我在開講時特別說明道：「正常的課程，是餐館掛牌的名菜；敦煌學這一從未列入正式菜單的課程，只能說是一羣好事之徒，登山涉水，在荒涼原野中，臨時張羅的野餐。這份野餐，可能粗劣不堪入口，也可能是從未嘗到的異味。不管結果如何，但同甘苦、共勞逸，有飯大家喫的精神，總是可以肯定的。」五年以來，研究期間，我們初步遭遇到的困難，便是紊亂不堪的寫本文字，既無字書可查，又無版本可校。像瓜字和爪字、門字和鬥字、雨字和兩字之類，寫法往往不分，困惑了無數敦煌卷子的讀者。我經過閱讀數千卷寫本之後，纔幸運的悟到一千年前遼代僧人行均所編的龍龕手鑑，乃是根據寫本編成的字書。他爲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，所以寫本中瓠瓢等字，既收入瓜部，又收入爪部，使得讀者立刻可以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。我們讀敦煌寫本時，又常常看到雙字作𩇛，雖然猜測雨隻可能是兩隻的會意，但猜測到底只是猜測。現在看到龍龕手鑑兩部平聲收錄了𩇛字，注云：「所江反，兩貌，今作雙，同。」入聲也收錄𩇛字，注云：「胡敦反，𩇛𩇛，大雨也。」這就證明了兩隻確是兩隻。我們用敦煌寫本的文字，證明了龍龕手鑑是根據寫本的字書；正好利用龍龕手鑑來解決我們讀寫本時的困擾。我們發現了這部書的價值後，便和研究所同學合力把全書編號作成索引，印成龍龕手鑑新編一帙，以供讀卷時的需要；也爲研究敦煌學的人貢獻一種解決文字問題的工具。這或許是我們野餐課程中嘗試到的異味吧！

今年敦煌學的課程又將開始了，回顧五十年來迢遞探索的歷程，雖然收穫不豐，內心常懷慚愧。但經驗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抱著學術報國的決心，認定從事學術，即是保衛國家；再加上小心、耐心，對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，生尊敬心，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，最後必定有更新更多的發現。我眼前彷彿置身在敦煌學一片廣闊的園地中，帶露荷鋤，蒼茫四顧，沈吟著謝靈運「不惜去人遠，但恨莫與同」的詩句，期盼著更多的身手不凡的園丁來共同從事墾殖的工作！

七十一年九月五日於華岡。

七十六年十月五日修定。